

把握战略主动 全力打造国家内河航运枢纽

王玉立

在考察湖南时，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湖南要“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作出了“建设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战略部署。湖南经过多年建设，目前高铁、高速公路、航空等国家枢纽基本就位，唯有内河航运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中心枢纽，我们应该从全局、长远和大势上作出谋划决策，把握战略主动，加快打造国家内河航运枢纽。

增强战略思维，下好水运交通战略大棋

内河航运是综合运输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着全球最发达的内河航运网络，分为川江（川黔渝）、洞庭湖（湘鄂）、鄱阳湖（赣皖）、京杭运河（江浙）、珠江（粤桂）五大航运区。湖南内河航运条件优越，通航里程达11968公里，排全国第三。洞庭湖位于五大航运区中心位置，在中国整个航运体系中举足轻重，打造国家内河航运枢纽有着天然的条件。但目前五大航运区的联通，只是通过长江干流单一通道，没有成环成网，湖南等中西部省份水运只能走长江出海。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还应站在全国水运网维度来思考，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下好水运交通战略大棋。

抢抓战略机遇，推动五大航运区联通成环成网

新的百年，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交通强国战略加快推进，五大航运区联通成环成网势在必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全国“两会”接连释放出“扩大有效投资，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信号，为此提供了政策支撑。当前全国各地都在谋篇布局，群雄逐“水”，抢抓战略机遇和主动。江西省投资3200亿元建设浙赣粤运河，继而打通湘

赣运河。从战略和经济价值来看，洞庭湖航运区作为国家内河航运枢纽的天然优势不可替代。湖南虽然西南三面环山，但山岭之间留下了一些低海拔的通道，凭借制度优势和基建实力，开挖三个方向的人工运河工程难度并不大。国内已有专家论证：秦朝修建了灵渠，早已打通湘江与珠江水系；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也是通过开挖人工运河，将首尾与大西洋和墨西哥湾连成航运环路，成为全球航运价值最高的河流之一。湖南要抢抓战略机遇，一是加快推进已纳入国家《水运“十四五”规划》并正在论证的湘桂运河建设，通过湘江联通珠江航运区；二是推动建设湘赣运河，打通绿干吨级航道，联通鄱阳湖航运区，进而联通京杭运河航运区；三是推动建设湘黔运河，持续加快沅水高等级航道建设进度，联通川江航运区。开挖运河把五大航运区连接起来，湖南将成国家内河航运枢纽，打通直达南海的第二出海口。

加快战略推进，全力打造通边达海的国家内河航运枢纽

1. 从国家战略安全高度认识建设内河航运枢纽的战略意义。加快战略推进，是湖南突破内陆之困，打造开放高地的战略选择和现实路径。一是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货物52%以上由水路运输。五大航运区联通成环成网，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和东海、南海两个大海口连成一个环路，海运距离缩短，内陆沿海贯通，发达便利、绿色低碳的水运将带动产业商贸繁荣，经济价值巨大，湖南在服务国家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地位更加凸显。二是有利于推动开放发展。“一带一路”建设、RCEP协议实施，东盟成为我国和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打通内河航运直达南海，运能大、成本低的水运优势将充分发挥。中西部省份大宗产品可水运出海，内河变成直达海

上丝绸之路的国际黄金水道，将更有力推动国际投资贸易合作和企业产品走出去，极大提升内陆地区开放水平。三是有利于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目前长江水运快速发展，三峡船闸运力日益饱和，上游至中游航运交通阻滞日趋严重，“长江单线出海”已显安全弊端。避开大坝阻隔和自然灾害、战时等因素对航运的阻断，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打通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第二出海通道，将极大提升国家战略安全。

2. 尽早成为国家战略。伟大复兴必将创造伟大奇迹。打造通边达海的国家内河航运枢纽，从长远看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发展大局，从当前看是扩内需、促增长的有效之举，利国利民，功在千秋。工程涉及多省份、多部门，必须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国“一盘棋”，科学论证，长远规划，国家相关部门统筹推进，组建全国内河航运联盟，吸引国际国内资本参与，形成举国之力。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已联名提案推动，争取国家高层重视采纳。湖南要扛起一域之责，服务国家大局，以高度的战略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担当，加快研究论证，为国家决策提供可行方案，积极促成进入国家战略。四川、重庆提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就是有益的借鉴。

3. 全力加快战略推进。一是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成立由省领导牵头的专班，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推进机制。二是大力推进前期工作进程，先期实施部分重点工程，加强省部联合，尽快启动湘桂运河前期研究，提出可落地实施的方案，继而推进东西双向联通工程。三是按照国际航运标准，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智能化水平，重点建设航运重要节点上的国际物流港，争取出台更多自贸创新政策，为内陆地区发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作者系省政协港澳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



丁亚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八百里洞庭湖，是湖南人民的母亲湖，也是湖南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生态功能作用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价值重要。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推动江湖协同、河湖共治，建千里湘江滨水走廊，还八百里洞庭碧波万顷”。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需要进一步加强洞庭湖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筑牢系统性保护理念。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创新立法模式与内容。在系统性保护理念下法治协同，立法是前提。洞庭湖环境保护立法时，应当把洞庭湖作为一个整体，实现流域圈与行政圈、法治圈的有机融合。立法协同，既是洞庭湖生态系统本身的需要，也符合一体化治理的要求，因此，制定、完善洞庭湖法律制度，既要考虑采取制定、完善综合性地方法规的模式，也要完善洞庭湖地方性立法的内容。也就是说，应当整合现有立法并补充完善以形成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同时，立法内容也应当是综合性

坚持法治协同 还八百里洞庭碧波万顷

的，应当涉及湿地、湖泊等各方面的环境要素。完善立法模式与内容，有利于解决法律制定人为切割导致碎片化的问题；有利于统筹整体规划、产业布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功能区定位、国土空间管控等方面的管理；有利于理顺洞庭湖生态保护机制，统筹各项功能、各种要素、各个地区建立综合的决策机制、实施机制和协调机制。

深化案件管辖改革。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当前洞庭湖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管辖仍然存在管辖模式松散、管辖依据缺失、管辖机制运行不畅等方面的问题。为此，下一步洞庭湖环境资源案件深化改革需要完善以下方面：一是完善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模式。提升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管理层级，对跨市（县）不跨省的洞庭湖环资一审案件由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管辖；对不跨市（县）的洞庭湖环资一审案件由洞庭湖辖区内的各基层法院管辖；湖南省高院负责洞庭湖环资案件审理的监督与指导。这种改革既符合系统性保护理念，也不需要改变现有法院架构另行设立专门法院。二是完善“三审合一”归口制度，将散布于其他审判庭的与环境资源相关的所有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均归口到环境资源审判庭进行管辖。三是完善特殊诉讼规则。由于跨区域管辖的案件可能不在本行政区划内，因此，应当为环境资源案件创设特殊的诉讼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举证责任、诉讼救济基金监管等制度内容，同时设置分散的便民诉讼

服务中心，以保障行政区划以外路途较远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推进一体化法律实施。洞庭湖流域跨区域环境资源保护，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形成“政府支持、司法保障、公众参与、多元共治”的环境资源保护新格局。一是构建环境资源保护协作机制。加强法院与检察院、行政机关的司法协作。比如，跨区域管辖法院应与同级别的跨区域管辖检察院做好沟通衔接，以便明确涉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移送起诉机关和相关法律程序；再如，当前环境资源审判中采用的增殖放流等新型责任承担方式，这涉及到流域系统治理的问题，应做好与渔业执法部门的衔接。同时，不同流域法院之间在审判、执行方面也需要加强协作与支持。二是加强法院司法裁判与法学院理论研究的互相促进。既提升法官运用法学理论知识解决环资审判实践中新问题的能力与水平，又为专家学者提供丰富的司法案例资源，实现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的良性互动。三是营造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共享与标本兼治法治氛围。重视人工智能在生态系统建设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加快整合洞庭湖生态环境数据资源，构建数据共享机制，让大数据赋能洞庭湖环境资源跨区域管辖。同时，5G时代应特别注重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说法、释法和普法活动，加大洞庭湖环境保护司法宣传力度。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付旭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不解决，比不巡视的效果更坏，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关键要在整改上发力。长沙县始终站在“整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的高度认识巡察整改，将整改工作贯穿巡察全过程，积极探索未巡先改、边巡边改、督查整改的全链条闭环管理，确保推动问题整改“见底清零”，最大限度地发挥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促巡促治作用。

一、巡前检视自查主动改，推动巡察整改关口前移。古语云：“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积极引导未巡单位自觉对照巡察发现的常见易发共性问题，主动提前开展未巡先查、未巡先改工作，有利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治病”于未然。针对巡察中发现问题，县委及时分门别类梳理出发生频率较高的共性问题清单，要求各级党组织主动对照问题清单，切实把自身职责摆进去，着力查找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真正将未巡先查、未巡先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努力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促巡促治。每轮巡察期间，坚持将被巡察单位开展未巡先查、未巡先改情况和纪检组织履行日常监督情况纳入重点检查范围，对因责任不落实、工作不深入，导致巡察检查与自查结果差异较大的，立即对被巡察单位“一把手”、纪检组织负责人进行约谈，责令其再检视再自查再整改。

二、巡中多方联动同步改，全面提升巡察整改质效。巡察期间，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被巡察单位。立行立改、边巡边改，对于发现的线索及时边巡边移、边巡边查，是传导责任压力、发挥巡察震慑、提高巡察质效的有效手段。在推进立行立改、边巡边改的实践中，我们探索建立高位推动、统筹协调、协同促动的整改落实体系，对于超出被巡察单位党组织自身整改能力范围，需要县委、县政府牵头研究解决和其他县直部门配合的重大、共性问题，由巡察

办和巡察组一道把问题描述清楚、分析原因、找准对策后，及时报县委批示，推动相关县直部门和被巡察单位同步联动整改；对于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系统性问题，易发、多发、屡禁不止的突出问题，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存在廉政风险点和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需要由其他县直部门牵头整改的问题，及时以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向相关县直部门下发巡察建议书，督促其限期整改到位；对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方面的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普遍性、突出性问题，各类监督检查发现的应改未改的突出问题，由巡察组及时向被巡察单位党组织下发立行立改交办单，督促其限期整改到位。

三、巡后台账销号倒逼改，实现巡察整改“见底清零”。强化问题整改是巡察工作的落脚点，只有严格实行台账销号管理，才能进一步压实巡察整改工作责任，确保巡察反馈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坚持建立整改台账促“清零”，积极建立问题线索、意见建议、书记点人点事、反馈问题等四套台账，按照问题类别、主要问题、具体事例、整改措施、责任部门、责任人等具体明细，逐一进行条目式清单化，定期动态更新，严格销号管理，坚决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压实整改责任促“清零”，要求被巡察单位要坚决落实政治巡察要求，严格履行整改主体责任，研究制定整改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结合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剖析检查，提出整改措施，抓好整改落实，全面巩固巡察取得的政治成果；严格整改督查促“清零”，出台《巡察整改督查办法（试行）》，对巡察整改情况进行量化评分，坚持定期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进行调度，对在整改期限内整改到位的问题予以销号，对未及时整改到位的问题继续跟踪督查到到位，对拒绝或拖延整改等问题实行严肃责任追究，同时要求整改排名靠后单位的“一把手”向书记专题会作出检讨说明。

（作者系长沙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长沙县委书记）

探索“职教高考” 为培养大国工匠注源头活水

廖艳琼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职业教育，是落实职教精神，探索职业教育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应该作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目标下的中国特色招生考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生源质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今年，职教高考成为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改革攻坚的“五大重点”之一。

目前，职教高考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行。山东、江苏等地已对“职教高考”进行试点，湖北实施技能高考，广东进行“3+证书”考试探索。湖南也在对口升学、单独招生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开创并实践了技能抽查的方式，为积极应对职教高考“职业技能”考试奠定了基础。全国“第一方阵”的湖南职业教育如何传承“楚怡”职教精神，用心培育更多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应在人才遴选源头上提高质量，在探索职教高考适应性路径上走在前列。

高站位领悟职教高考精神。作为高考生源大省的湖南，要把把握职教发展机遇，认清职教高考对于选拔多元人才的重要意义。职教高考对标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迫切需求，承担着职业技术类人才甄别与选拔的任务。面对职教生源结构复杂、招生路径和方式复杂的现状，职教高考需围绕培养“高层次、高技术、高能力的技能型人才”这一价值引领目标，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考核标准，构建职教高考多样性考核体系，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诉求，破解选拔机制的组织难、实施难、评价难、现实难题。“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职教高考制度的设计本质上为高质量高职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价值取向。

探索职教高考科学发展机制。推行职教高考是推进现代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性举措，更是优化人才类型定位、畅通人才一体化培养通道、公平实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关键。湖南高质量促进职教高考发展，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建立省级组织，根据学校和专业不同主体的需求及任务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二是科学设置，设立职业教育专门机构，制定考试、招生、录取各环节规则，保障职教高考制度落地实施；三是打造示范标杆，采取“小切口、大支持”的形式，建设几所职教高考教育示范学校，打造标杆提振信心，为提高职教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职业教育形象蹚出路子。

创新职教高考“湖南模式”。“惟楚有材，怡然乐育”，以“楚怡精神”高标准打造湖湘特色的职教高考之路，为培养高质量职教人才夯实源头活水。一是对接特色产业，立足省情，助力湖南“三高”的打造，以市场发展需求、产业升级方向和技术变革趋势为指引进行职教人才遴选。例如对接我省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为“专业集群+产业链”的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打造定制版职教高考，挑选适应性人才。二是服务特色产业，落实“楚怡行动计划”，吸引高素质及特色技能人才报考我省职业院校，从院校发展的宏观层面和人才提升的微观层面精准设计考试框架，充分体现我省职业教育培养特色。三是积累特色经验，学习考察国外和省外的先进范式，对招生对象、考试设置、录取机制等方面进行细化，制定切合实际符合省情的地方细则。

（作者系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學院副教授，本文为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科研规划课题“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职新媒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XH2021037）



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文化产业升级

杨一欣

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要“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近年来，我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依托数字经济推进文化、旅游、科技的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但从总体来看，湖南文化产业相比广东、北京、上海等文化强省尚有一定差距。需要结合我省本土发展特征，通过包括网络通信技术、智能算法技术、数字版权技术、影音编码技术等在内的广义的数字技术进行开发手段、商业组织模式、供求关系形态进行调整，对文化产业生态体系进行更新再造，并最终促成产业升级。

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基础设施转型，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疫情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投资领域。“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数字文化产业作为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而生的新形态密切融入数字基建中，就要全面建设以信息技术交换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支持面向行业通用需求，建设数据中心、云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文化产业“云、网、端”基础设施，打通“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智能化

计算”数字链条。建设文化产业类公共平台，从而加强产业主体间的共同协作，促进技术共享和技术更新换代，重塑生产流程。鼓励数字文化企业参与企业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合作，完善文化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所需基础数据、计算能力和模型算法，推动传统文化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APP、小程序等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领域数字经济生产要素，促进产业互联互通。

深刻把握数字文化内容属性，加强原创能力建设

既要立足于湖南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把握时代机遇，培育和塑造一批具有鲜明本土和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创IP，更需结合时代命题，充分运用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视频、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产业形态，打造和保护新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品牌。充分认识到文化对其他相关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强化文化对旅游的内容支撑，以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引领青年文化消费，创作满足年轻用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产品与服务。

发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价值和作用，推动产业数据资产化

要将数据视作如同资源、能源一样的生产要素，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思维转变。第一，要充分收集和占有数据，针对不同的生产环节建立数据库，而不是

依靠少量的随机样本做产业决策。第二，充分分析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从高相关性之间做出分析与预测。第三，深入挖掘数据价值。大数据可以提供有效的参考，从而精确了解出版产业链上的实时和反馈数据，通过构建以“数据+算力+算法+场景”为支撑点的文化大数据服务中心和出版业知识服务云平台，及时掌控产品、服务、用户和市场情况，形成文化产业内容生产的体系闭环，实现资源综合效益最大化。在保障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有序推进文化数字资产和数据资产交易。

挖掘新的市场增长点，培育市场主体

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数字文化企业，引导互联网及其他领域龙头企业布局数字文化产业。支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企业发展，扶持中小微数字文化企业成长，培育一批垂直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要围绕市场需求，根据多元新业态策划内容和产品生产，寻求新的增长点。发挥产业孵化平台和龙头企业在模式创新和融合发展中的带动作用，通过生产协作、开放生产、共享资源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整合优质技术资源，引导支持文化企业加大对数字技术应用的研发投入，支持自主或联合建立技术中心、设计中心等机构，完善组织架构，推动产品服务和业务流程改造升级，实现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的跨越。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